

□叶方兴

水污染的社会学想象力

□“次生焦虑”是一种社会性的焦虑，对于现代化进程中水污染所引发的次生焦虑应当置于社会当中加以考虑，因为水污染问题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的问题。

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

陈阿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针对如日中天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米尔斯提出了他闻名于世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社会成员的一种心智，“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米尔斯著：《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P3）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理解个人生平和历史之间关系的能力，是将个人在其周遭遇到的问题与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的能力，当人们从事社会学思考时，需要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结合起来。

水污染由来已久，大到整个国家的工农业生产，小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工业化浪潮以及后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展开了对资源与环境无穷尽的掠夺和破坏。水资源已经不仅仅具有原生的意义，而是成为工业化、现代化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水污染也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点状、偶发式的出现，而是现代社会工业化和现代化

过程中多重利益群体共同形成的结果。当下水污染及其防治并非简单地归结为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系统的社会问题。任何一起水污染事件的背后总是体现出特定的社会背景、主体的心理态度以及历史文化传统。这样，要获得对水污染的完满理解就需要我们能跳出以水系统（水污染）本身来理解水污染的逻辑，将其与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等社会系统要素联系起来，而要做到这些，无疑需要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太湖流域是一个与水有缘的地域，河网密集，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大量的工业污染物的无序排放，整个太湖及其流域变成了巨大的“纳污场”，近年来，爆发了一些大型的水污染事件，如6·27事件、2007年的太湖蓝藻事件等。陈阿江教授的《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一书正是以太湖流域水污染这一问题为现实关切，运用社会学的参与观察、田野调查、访谈等方法，试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水污染形成的社会文化机理，反思我们现

有的治水策略，揭示太湖流域水污染的形成过程、社会历史原因以及防治策略。它将特殊性现象的水污染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中，尤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对其



进行社会学的研究，揭示其引发的“次生焦虑”的成因和对策，充分地表现出社会学的想象力特质。

从社会学看来，水污染问题无疑是人们在利用水资源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关系的一种表现形态。“水只是扮演这些‘故事’的舞台，而人与人的竞争、合作、矛盾、冲突才是问题的本质。”（陈阿江：《论水人和谐》，《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4期）通过对6·27事件和民间零点行动的分析，在太湖水污染过程中，不同的利益主体表现出不同的面相：企业家的“理性算计”，技术专家丧失独立性，经济学家不露面，相关职能部门收取排污费“脱贫致富”，普通老百姓保持沉默，只有“傻子”吴法庆和“疯子”吴立红之类为水污染奔走（陈阿江：《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P7，下文简称《次生焦虑》）。应当说，在太湖污染的诸多事件中，单一的社会主体是无法促成事件发生的。正是各利益群体相互之间的算计才“酝酿”出水污染的种种集体事件。一定意义上说，当前的水污染问题是不同利益主体理性共谋的结果。企业家的“简单理性”能够保证在承担零成本的前提下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

化，相关职能部门为获取灰色收入“脱贫致富”，普通民众忍气吞声一再妥协。当然，除了自觉的反污斗士之外，水污染事件当事人的理性是一种短视的、简单的算计理性，不过

是市场经济下行为主体的市场化。

要根治水污染关键还在于人身上。所以，“治污的核心是治人”（《次生焦虑》，P231）。只有寻求一套有效的方案，对人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才可能减少或根治污染问题。所以，在治水的策略上，没有考虑到人的方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此，我们需要反对以技术万能主义为导向的技术主义治水范式。

人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传统当中，一些传统的特征成为人们当下社会认知的“前见”。在水污染的问题上，我们能够找到影响人们行为的社会历史原因，从而有助于我们解释水污染的社会文化特征。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进行视角上的跃迁，“从人的行动到行动背后的社会历史背景，努力探寻它的社会文化机理”。（《次生焦虑》，P189）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们单向度地追求经济利益，造成了价值观念的迷失，对基本问题丧失了判断力。“社会失去了目标，基本价值观、基本规范领域存在着普遍的冲突”（《次生焦虑》，P154）。“社会失向”是造成水污染形成的社会心理原因。“如果社会整体迷失方向，社会上的多数人也就不失去了行动的目标。”（《次生焦虑》，P155）那么，对于水资源

的使用也就不免缺乏长期、理性的考量，污染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实践中，人们说一套做一套，“文本法”与“实践法”的分离无疑也加剧了污染的生成。已有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被“潜规则”所取代，虽然有文本法可依，但事实上人们却各自按实践规则行事，排污的仍旧排污，收费的仍旧收费，沉默的依旧保持沉默。

从文化的角度说，市场经济与中国社会的性善论假设是分不开的。传统中国社会是熟人组成的乡土社会，人们彼此之间是相互熟识，彼此了解、信任。在连听脚步声都能判别是谁的传统社会中，没有理由将别人设想为罪大恶极的“恶人”，人们自小从《三字经》中就接受了人性本善的思想。与传统中国不同，西方文化对人的理解始终存在“恶”的假定。市场经济建立在一套制度、规则的基础上，而制度、规则的建立正是基于人性恶的假定，既然人性本恶，只能通过外在约束加以矫正。市场经济与中国文化土壤难以相融，尽管我们接受了它，但“在深层结构里，我们并没有真正转型，如对人性恶的抑制机制就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次生焦虑》，P174）所以，当市场经济一边在创造 GDP 一边在排污的时候，我们不免显得手足无措。

现代化无疑是当前各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事实。西方国家率先开启现代化的进程，其间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问题。不过，西方国家在污染问题上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解决方案。我国30年的改革开放，GDP总是平均以两位数增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增长奇迹。然而，我们用30年的发展实现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从这个

意义上说，我们经历的这场现代化运动无疑是猛烈的、势不可挡的。

从这场现代化运动来看，水污染的出现带有某种必然性，污染背后的人们也带有“被支配”的色彩。现代化如同势不可挡地驶向未来的航船，在这种必然性的面前人们的很多行为确实很无奈。现代化的一大特点就是追求工具理性，注重效率，讲究数字，这就造成对现代化的评估往往能够通过一系列可以量化的技术指标来实现。各地的经济发展一味地追求数字指标和数字 GDP，一些地方的领导讲究政绩、搞面子工程，片面地追求数量，忽视了环境保护，结果是经济总量上去了，但环境被污染了，生态被破坏了，水变得污浊了。正因如此，“水污染是非理性社会运动的副产品，它时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追赶型现代化中，它是一种非理性的冲动”（《次生焦虑》，P177）。个人在这场由现代化引发的水污染事件中也是无能为力。个人无法阻止水污染这样的由现代化运动带来的集体性事件。

所以，当社会发展遭遇势不可挡的现代化，传统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遭遇西方市场经济，不仅出现了水污染这样规模性的社会事件，更重要的是引发社会现代化中人们的心理焦虑。这种在追赶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性焦虑”被称为“次生焦虑”，它区别于韦伯笔下新教徒在尘世中勤勉追求以证实是否成为上帝选民时内心的“原生焦虑”。追赶现代化引发了次生焦虑，“中国社会的次生焦虑是中国的环境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的社会文化根源。”（《次生焦虑》，P187）

流域的水污染是一个系统、复杂的社会问题。流域水污染治理的复杂性在于它

涉及不同地域的不同利益主体，交错着人类的本能与理性、现实与期待、善良与丑恶等。在治理水污染时，我们需要照顾到区域上的“本地”与“外地”，主体上的“当事人”与“受害人”，时间上考虑到“短期”与“长远”。所以，“流域治水必须系统地、综合地考察，统筹解决”。（《次生焦虑》，P229）

事实上，水污染仅仅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它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当下社会的整体性发展是分不开的。在治理水污染问题时，需要将水污染放置于社会系统之中，厘清社会系统其他结构要素与水污染之间的关联性，寻求系统治理之道。社会结构的转型、行政体制的完善、制度规章的健全、经济发展方式的优化以及社会心理的转型都直接关系到水污染治理的社会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水污染问题关键还在于水之外；通过水之外的社会系统要素的发育与优化才能根本解决水污染问题。因为，从根本上说，水污染是“社会病”，水污染治理应当是“社会策略”（《次生焦虑》，P230）。

通过上述几个方面构筑起水污染的社会想象，为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水污染提供了广阔的理论视野和拓展了该命题的理论纵深。一般说来，社会学在水污染的问题上可以有两方面的作为：“一是进行基础研究，从学理层面上认识水污染形成的社会文化机理；二是为企业、政府或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陈阿江：《水污染的社会文化逻辑》，《学海》2010年第2期）而这与社会学对水污染的认识是分不开的，《次生焦虑》的研究至少可以向我们表明：水污染问题是一项社会问题，它的产生有着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原

因，水污染的治理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整体、系统地解决。顺着《次生焦虑》开启的想象之路，我们还可以将水污染的社会学研究进一步深化下去。

首先，要从深层次的现代社会结构中揭示水污染的社会原因，还需要借助“现代性”的分析框架。水污染在现代化历程中逐步凸显进而成为问题，但要真正地认识肇始于西方的现代化，就不得不提及“现代性”，因为“现代性”是“现代化”所要达成的目标，而“现代化”则是“现代性”展示的过程（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P5）。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现代性预定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视自然为人类可以任意改造的客体，这样，在人类理性的驱使下对自然采取的任何破坏行为都是正当、被允许的。人类自居其神圣主体的地位，对自然无情的征服、利用。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表现为，为了经济利益最大限度地掠夺、破坏自然，以牺牲自然环境换取社会发展。恩格斯曾在100多年前就已勘破这一事实，道出人类过分破坏自然的后果。“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P383）现代性引发了人们对水资源的无节制的破坏，水资源被一步步地工具理性化，以至于最后仅仅剩下藏污纳垢的功能，污染便由此而生了。

其次，就水污染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而言，传统中国的社会制约机制有其特殊

性。西方社会讲究通过规则进行外在的制约与约束，通过规范的引导和强制来防止水污染的发生或对水污染的惩罚。与西方不同，中国是人情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凭的是情感、德性，社会制约方式主要通过“脸面”来完成的。对于一个中国人而言，什么都可以不要，但不能不要“面子”。脸面观点始终制约着人们，保证他们做出正当、合适的行为。宽泛言之，西方规则制约与传统中国的脸面制约是西方法理型社会与中国情理型社会两种不同的社会制约方式。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当传统遭遇现代、东方遭遇西方时，我们会发现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实现水污染的监督与管理效果甚微，这也是“文本法”与“实践法”相分离的历史文化原因。传统是理解现代的钥匙，对于现代化中出现的水污染，可以从传统中发掘这一现象的历史文化原因。传统中国社会的关系社会、人情社会特质以及其特殊的社会制约方式成为理解水污染的重要思路。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也就无法揭示水污染发生的历史文化逻辑，进而也不能有效地寻因求策。

最后，从水污染防治的社会策略上看，随着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民间组织力量以及志愿性组织可以成为维护水污染的有效力量。《次生焦虑》为我们描绘出不同利益群体面对水污染时的众生相，不同的利益群体表现的态度不同，但我们可以明显判断出这当中存在强弱之分。政府、企业主始终处于强势，而普通百姓处于弱势，只有“反污斗士”吴法庆、吴立红被尴尬地视为“傻子”和“疯子”。可以说，在这样一系列集体共谋的群体性事件中，民众与社会力量是微不足道的，除了忍气吞声就是保持沉默。

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具有独立性、公共性以及志愿性的社会组织在不断地成长，其中不乏一批以环保为主题和任务的社会组织，参与到环境资源的保护当中。可以说，在当前，社会组织已逐渐成为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据统计，我国民间环保组织多达3700家，而且呈增长趋势，将逐渐发展成为国家、企业之后重要的第三方力量，发挥着宣传、教育、监督以及建言的作用。

水污染是一项社会问题，它的解决也必然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民间社会组织无疑将成为有效的制约力量。太湖流域的普通民众在污染事件中基本处于失语的状态。如果说在太湖水污染实践中，存在一批有组织的“傻子”和“疯子”，他们形成一股社会力量介入污染事件当中，事情的结果可能会更加有所好转，至少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民间社会组织不仅起到基本的宣传、普及水污染常识的作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监督、影响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干预企业的不法排污现象，以及制约两者之间可能出现的污染共谋行为。

诚如《次生焦虑》作者所言，“次生焦虑”是一种社会性的焦虑，对于现代化进程中水污染所引发的次生焦虑应当置于社会当中加以考虑，因为水污染问题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的问题。作者在构筑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思考社会学视域下的水污染问题提供了进一步想象的空间，也许正是这种无限的社会学想象力才是本书以及本命题的永恒魅力之所在。^[2]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李笑婷)